

掙扎在威權政體與族群政治中的媒體改革—— 以馬來西亞「撰稿人聯盟」的實踐為例*

黃國富**

中文摘要

馬來西亞的威權體制與族群政治環境中，媒體一直受到許多限制，近年由民間組成的媒體改革團體要有所作為，除需衝撞體制，也要面對糾結的族群問題，而這涉及了族群內部與不同族群間的各種因素，使媒改問題更形複雜。本文以「撰稿人聯盟」的實踐為例，試圖說明這個由華人所組成的媒改團體，其出現與實踐過程，相當具體地展現了這樣的困境。本文認為要突破這困境，除要打破族群政治的框限，橫向連結其他公民團體，壯大改革力量，也需深耕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理念，號召更多民眾加入媒改行列，共同改善媒體環境，協助馬來西亞邁向民主化。

關鍵字：威權政體、族群政治、民主化、媒體改革、壟斷

* 本文原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亞洲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東南亞企業研究中心與亞洲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主辦之「2008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論文研討會」，2008 年 4 月 25-26 日。

**作者為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生。Email: kockhoo@gmail.com

本文收件日期為 2008 年 6 月 27 日，接受刊登日期為 2008 年 10 月 2 日。

Struggling with State Authoritarianism and E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a: A Case Study of the WAMI Media Reform Organization

Kock-Hoo WONG

Abstract

Malaysian media operate in an environment constrained and limited by state authoritarianism and ethnic politics. Recent grassroots media reform organizations must contend with the existing regime while simultaneously deal with the country's complex ethnic-relations. The latter involves both inter-ethnic and intra-ethnic group factors that then put the media reform project in an awkward and complicated position. This study on the emergence and practice of the Writer Alliance For Media Independence (WAMI), a media reform organization constituted exclusively of Malaysian Chinese, provides important insights on these issues. Specificall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media reform organizations should link horizontally with other civil organizations to expand and broaden the power base of reform and also to deepen the ideological work concerning concepts of the freedom of speech and of the press. Additionally, it is necessary to mobilize more citizens to join the media reform project to improve the media environment thereby contribute to the continuing democratization of Malaysia.

Keywords: Authoritarianism, ethnic politics, democratization, media reform, monopoly

一、前言

1957 年馬來亞¹脫離英國的殖民統治後，新成立的威權政府延續前殖民者管控傳播媒體的政策(Mustafa 2000:99)，甚至變本加厲，訂立各項法規限制言論與新聞自由。執政黨也逐漸把手伸入各種傳播媒體，²陸續掌控多家主流媒體的所有權，主導了國內資訊傳散與意見討論。

1960 年代興起的「現代化理論」，號召後進國家學習和模仿西方世界，而現代化的媒體系統是國家實現從「傳統」邁向現代的重要工具，但事實上許多後進國家中的媒體無法實現「教化民主」功能，反而成爲維護政治體制的工具，「現代化理論」則常被掌權者用來正當化其限制言論自由和政治控制的作爲。與現代化理論一樣，媒體帝國主義(media imperialism)也可以被用來支持在後進國家中專制政府對民間所施行的監控。因爲西方帝國主義威脅著「亞洲價值」(Asian values)和「東方本質主義」(Eastern essentialism)，它們分別被保守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統治者運用，作爲其壓制自由的藉口(Curran and Park 2000:4-6)。馬來西亞政府在過去數十年裡，即以現代化理論與西方帝國主義做爲依據，正當化對媒體環境的嚴格管控，限制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讓全民能同心協力共同發展國家及抵抗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Zaharom 2000)。

從比較的觀點來看，1987 年解嚴以前的台灣與南韓新聞界，是輔助政府與依賴政府的言論工具，而非嚴格意義的喉舌；它們在政治上服從政府，但在非政治領域卻保有活動的空間。以台灣爲例，國家完全壟斷電視頻道，且操縱大部分的廣播電台；報紙部分，1970 年代以後，逐漸形成《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兩大報系寡頭壟斷的結構，報紙與國家建立了「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政府給兩個報系巨大的政治與經濟利

¹ 1957 年馬來半島的十一個州組成馬來亞(Malaya)；1963 年新加坡與婆羅洲的沙巴(Sabah)、砂拉越(Sarawak)加入，組成馬來西亞；1965 年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成爲獨立的國家。

² 馬來西亞的國營與私營廣電媒體由分別政府、執政黨黨營財團與親政府大財團所有(參見 Zaharom and Mustafa 2000)；除中文報紙外，主要的巫、英印刷媒體陸續被執政黨所掌控。

益，以換取它們的效忠(李金銓 2004:137-138)。

馬來西亞威權政府早期對媒體的控制不似台灣與南韓那麼嚴厲，且因為長期所形成的族群政治，使「族群因素」對這國家的各種議題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這也使得政府對媒體的控制顯得更加複雜。以中文印刷媒體為例，相較於其他語文的媒體，早期大部分中文報紙仍由華裔商人所有，論者也認為中文報紙享有較開放的言論尺度，³它們從維護族群權益的立場，對政府一直有相當多批評的聲音，且報老闆與政府的關係較為疏離，侍從的關係較不明顯。1980年代中期以後，當台灣與南韓社會邁向民主開放，馬來西亞則在馬哈迪擔任首相期間逐漸強化對媒體的管控，與政府關係良好的大財團開始掌控中文報紙，使得中文報紙的批判力受到一定程度影響，政媒關係更趨曖昧與複雜，但是否能以「侍從關係」來看待，還需要更細緻的探究與討論。

以上所述大致可看出馬來西亞的媒體環境處於一種倒退的狀況，威權政府對媒體的掌控愈趨嚴密，但也引起民間的反彈，「維護媒體獨立撰稿人聯盟」(Writer Alliance For Media Independence，簡稱「撰稿人聯盟」，WAMI)的出現與實踐，就是試圖改善馬來西亞日趨惡劣的媒體環境，協助社會邁向民主化。

「撰稿人聯盟」的成立，始於2001年5月，當時馬來西亞執政聯盟國民陣線(Barisan Nasional，簡稱國陣)⁴成員黨馬華公會(Malaysia Chinese Association, MCA)透過黨營企業華仁控股(Huaren Holding)的子公司華仁管理私人有限公司(Huaren Management Sdn Bhd)，擬收購南洋報業控股，⁵

³ 王賡武認為1980年代前馬來西亞中文報紙的言論尺度，是華人地區中最公開曝露的(引自楊建成1982:7)；曾於1970-1985年間擔任《南洋商報》總編輯的朱自存也指出，在其任內未曾接獲政黨的各種命令或指示，不過，新聞工作者不能違反報老闆的政治立場，也不能違反報老闆的商業利益(潘永強、魏月萍編2002:127)。

⁴ 1955年巫統(UMNO)、馬華公會(MCA)與印度國大黨(MIC)組成「聯盟」(Alliance)，成為馬來西亞自治時代的執政聯盟，這三個政黨的成員分別是馬來人、華人與印度人。1974年，「聯盟」擴大組織，成員由原來分別代表三大族群的三個政黨，增至目前的14個政黨，名稱改為「國民陣線」，且迄今仍掌握馬來西亞政權。

⁵ 南洋報業旗下有《南洋商報》、《中國報》等十餘份報刊。

引起華人社會(簡稱華社)嘩然，指責執政黨企圖掌控華社的輿論。這些反對的聲音無法制止馬華公會的收購行動，同年 5 月 28 日，南洋報業控股的 71.5% 股權落入馬華公會手裡。反對執政黨介入民營媒體者把這天稱為「528 報變」，視為對華社長期擁有相對自主的一大打擊。

在馬華公會進行收購期間，傳出南洋報業控股的長期競爭對手--朝日報業(後改名為星洲媒體集團)為馬華公會的合作夥伴，因而對收購事件的相關新聞多不予以報導，甚至傳言指朝日報業乃收購案的主角，其意圖為壟斷馬來西亞的中文報業。⁶

為抗議政黨收購與財團壟斷中文報紙，42 位評論人⁷於 2001 年 5 月 26 日發表聯合聲明，停止供稿給南洋報業旗下的《南洋商報》、《中國報》與朝日報業的《星洲日報》、《光明日報》。當收購情勢明朗後，陸續有其他評論人加入，並於 6 月 8 日成立「撰稿人聯盟」。

「撰稿人聯盟」採取消極的罷寫行動後，未能改變南洋報業的命運，因此，他們也採取積極的突圍方式，一方面出版專書和在非主流報刊進行批判，同時陸續出版另類雜誌與建立新聞網站，試圖提供閱聽眾不同的訊息，持續衝撞政府與媒體集團所控制的言論空間，其中多人甚至被政府和主流媒體列為黑名單，⁸不得在主流報紙上發表文章。經過數年努力與摸索後，「撰稿人聯盟」逐漸轉型，試圖跨越族群、語言與宗教的限制，在爭取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理念下，與國內其他公民團體進行連結，進行政治上的遊說與抗爭，要求廢除各種壓制言論與新聞自由的惡法，改善媒體環境，以促進國內的自由與民主。

⁶ 南洋報業與朝日報業兩大報團若合併，其銷售市佔率將超過八成。2006 年 10 月，馬華公會將南洋報業部分股權出售給星洲媒體集團執行主席張曉卿，使其成為南洋報業最大股東，但馬華公會仍握有一定份額的股權；2007 年 1 月，星洲媒體集團宣布與香港明報集團合併，並邀請南洋報業參與；2008 年 4 月，三個媒體集團完成合併，組成世界華文媒體集團(簡稱世華媒體)，且同時在馬來西亞與香港上市。

⁷ 馬來西亞中文報紙除報社編制內的新聞工作者負責報導新聞與評論外，報社也會邀請一些各領域的人撰寫評論時事的文章，增加報紙的可讀性與提供各種不同的意見，一般稱這些寫評論文章者為撰稿人或評論人。

⁸ 根據資深評論人李萬千(2006)的說法，約有十餘名華文作者，被政府禁止在中文報紙發表文章。

「撰稿人聯盟」這個因應特定情勢所組成的團體，其成員多是在各行業的受薪階級，異質性相當高，在威權政體與媒體集團的壓力下，步履蹣跚的走了 7 年，它的實踐頗值得關注，尤其他們在面對威權政體和處於族群政治環境中，如何採取行動？又受到何種限制？釐清這些問題與局限，對其他國家的媒體改革運動有一定的參照價值。

二、政府對資訊流通與言論空間的管控

長期以來，馬來西亞執政聯盟對媒體採取嚴格的管控，甚至直接介入媒體的經營。首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engku Abdul Rahman)在 1961 年成功使巫統(United Malay Nation Organization, UMNO)全面控制了馬來人社群中頗有影響力的馬來文報紙《馬來前鋒報》(Utusan Melayu，後來易名為 Utusan Malaysia《馬來西亞前鋒報》)；第二任首相敦拉薩(Tun Abdul Razak)則在 1972 年把歷史悠久的英文報紙《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後來易名為 New Straits Times《新海峽時報》)股權從新加坡人手裡，轉移至巫統手中(Mustafa 2000:100-103)。

除巫統直接介入媒體，馬華公會也動作不斷，於 1976 年收購由香港名作家金庸(查良鏞)創辦的《新明日報》(中文報，1994 年停刊)，1981 年再收購《馬來亞通報》(中文報，1994 年停刊)。除了中文報紙外，馬華公會也於 1979 年透過華仁控股收購了發行量最大的英文報紙《星報》(The Star)。因此，在 1970 年代，馬來文與英文主流報紙已落入執政聯盟手裡，而歷史悠久的兩大中文報紙《南洋商報》與《星洲日報》還掌握在華僑手裡，政治上的干預也較少，其中原因可能是對政權的威脅較小，因此還不需直接控制中文報紙，以掌控華社的輿論，至於國大黨則掌控了淡米爾(Tamil)文報紙。⁹

1981 年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成為第四任首相，開始長達 22 年的

⁹ 譬如“Tamil Nesan”由現任國大黨主席三美維魯(Samy Vellu)的家人所掌控(Mustafa 2002:148)。

強勢執政時期，也讓馬來西亞的媒體環境陷入黑暗期。這位曾被「保護記者協會」評為「世界十大新聞自由公敵」的國家領導人，重新詮釋西方所發展出來的「社會責任論」，即認為具有民意的政府當然有權力管制媒體，以免其破壞社會的和諧，阻礙了國家的發展。

馬哈迪擔任首相期間，媒體環境出現兩種重大變化，一是政府修法更嚴格管控媒體；二是媒體所有權的集中化與集團化(莊迪澎 2004:22)。在修法部分，馬哈迪政府先後修訂了〈內部安全法〉、〈官方機密法〉與〈印刷報業與出版法〉(Printing Presses and Publications Act)等，嚴格管控媒體。1987年，身陷黨爭與多項醜聞的馬哈迪，在國內社會情勢愈趨緊張的情況下，展開「茅草行動」(Operaci Lalang)，以內部安全法拘留百餘名異議人士，且取消三家報社的出版許可證，這三家報紙分別是馬來文報紙《祖國報》(Watan)、英文報紙《星報》(The Star)與中文報紙《星洲日報》，¹⁰這起事件所形成的寒蟬效應，一直延續至今。

在媒體所有權的集中化部分，馬哈迪政府將媒體逐步整合形成數個媒體集團，由國陣成員黨和與其關係密切的財團經營，除能控制資訊傳遞與言論方向，協助維繫國陣政府的政權，也能從中獲取龐大的商業利益。

在中文報紙部分，政府採取較為間接的方式進行管控，1988年與國陣關係密切的伐木業鉅子張曉卿跨入媒體領域，¹¹取得《星洲日報》的經營權；1992年張曉卿再收購《光明日報》後，逐漸建立中文媒體集團，把集團觸角延伸至國外。另一名與安華及巫統內部關係密切的商業鉅子郭令燦則於1991年2月入主《南洋商報》¹² (Gomez 1999:153-157)，並於半年內收購《中國報》與生活出版社，組成南洋報業控股，成為當時馬來西亞最大的中文報業集團。在1980年代後期至1990年中期，多家中小型中文報

¹⁰ 《星報》與《星洲日報》在數月後復刊。

¹¹ 該集團主席張曉卿曾任執政聯盟成員之一的人社黨副主席和國會上議員；另根據《富比士》(Forbes)所公布馬來西亞2007年的富豪排行榜，張曉卿在馬來西亞排行第十，擁有的財富達11億美元(中國報2008)。

¹² 在1980年代中期，《南洋報業》重組股權以符合股權本土化政策時，巫統黨營事業已開始介入，取得30%的股權。

紙停刊，使原本相當多元化的報業市場，呈現兩大報業集團主導的態勢，並展開激烈的商業競爭。

在 1990 年的全國大選中，數個在野黨結盟組成「反對黨聯合陣線」(簡稱「反陣」)，挑戰執政多年的國陣，當時社會充滿對「兩線制時代」¹³的期待和幻想，希望藉由團結的反陣制衡傲慢的國陣，而中文報紙也以大篇幅版面報導有關反陣的訊息。最後國陣還是獲得逾三分之二的國會議席，但得票率僅略超過五成，¹⁴其中華人選票大量流失，讓政府驚覺中文報紙的影響力，甚至把它視為反對政府、¹⁵煽動族群緊張關係與破壞國家安寧的媒介(黃招勤 2004:29-79)。因此，過去因為被邊緣化而能擁有一定言論空間的中文報紙，成為政府進一步監管的對象。

譬如在 1991 年 12 月發生的「柔佛古廟山門被拆事件」中，華人社群對處理這事件的柔佛(Johor)州政府很不滿，中文報紙也以顯著版面刊登相關新聞與評論，當時的副首相安華(Anwar Ibrahim)批評中文報紙「誇大小課題，以醜化華人政黨(馬華公會)的形像」及「激起華人對政府的憎惡」，結果使得中文報紙淡化處理相關議題，許多評論文章皆不能刊登(莊迪澎 2002:79)。

1995 年大選後，馬華公會現任總會長黃家定被馬哈迪委任為副內政部長，這是首次有馬華公會領導人擔任此官職，論者多認為黃家定的任務是緊盯中文報紙(古玉樑 2006:120；黃招勤 2004:73)，而黃家定也透過「溝通」與「對話」的「軟控制」方式(莊迪澎 2002:54)，讓中文報社直接感受到來自政府的壓力。

1997 年發生亞洲金融風暴，馬來西亞的經濟發展遭受重創，政治情勢

¹³ 「兩個陣線」的概念是在 1986 年由「全國華團民權委員會」提出，主要是針對馬來西亞特殊的族群政治環境裡，追求一個當時最可能的民主制衡制度，因為英美的「兩黨制」還遙不可及(祝家華 1994；王國璋 1997)。

¹⁴ 馬來西亞在野黨在歷屆國會選舉中平均得票率超過四成，但由於單一選區制和選區劃分的人為扭曲(gerrymandering)，使得國陣一直保有霸權的地位(潘永強 2004:163)。

¹⁵ 《南洋商報》前總經理郭隆生回憶，選後馬哈迪召見各報總編輯，大罵中文報紙，他自認替華社做了很多事，不明白華社為何這樣對他(黃招勤 2004:79)。

也發生劇烈變化。1998年馬哈迪與副首相安華關係破裂，隨後安華被馬哈迪革除職務與開除黨籍，並因瀆職等罪名被判入獄。安華被捕後引發「烈火莫熄」(reformasi，馬來文原意為改革)抗議浪潮，參與者多為馬來人，民間也出現各種自發性的改革團體，包括推動媒體監督與推展新聞自由的運動，這段期間曾出現「退報運動」，抵制巫統的黨營媒體(莊迪澎 2004:164-165)。反觀其他族群成員參與的並不多，使整個「烈火莫熄」運動猶如馬來社會內部分裂所出現的鬥爭，這也明顯展現了馬來西亞社會族群分歧的特點。

1999年的大選期間，佔全國人口逾60%的馬來社群內部明顯分裂，對政府的不滿持續延燒，在野黨聲勢看漲，回教黨(Parti Islam SeMalaysia，簡稱PAS)黨報《哈拉卡》(Harakah)的發行人，甚至超越巫統掌控的馬來文主流報紙《馬來前鋒報》與《每日新聞》(Berita Harian) (Zaharom 2002:137)。大選結果顯示，約半數馬來人將選票投給在野黨，但也有可觀的非馬來人支持國陣(Khoo 2003)，加上選區畫分的優勢，才保住了政權。¹⁶在政經情勢不穩定的局勢下，馬哈迪更是緊縮言論空間，並關注與打擊迅速崛起和不斷突破政府封鎖消息的網路媒體。¹⁷

綜上所述，基本上顯現出巫統做為馬來西亞威權政體中，長期以來最主要的力量，當它面對壓力時，會週期性地運用族群政治的手段克服困境，但巫統大致上仍承擔起「負責任角色」，不會放任各族群在語言上的衝突，而是將族群政治的日常管理，擺在政治議程的最前端(潘永強 2007:87)。在操作族群政治的過程中，媒體成為巫統的重要工具，而馬哈迪這位「魅力型領袖」(charismatic leader)也是歷任領導人中最擅長此道者，使族群政治的氛圍始終瀰漫在馬來西亞社會，人民不易擺脫族群政治的運作與思考邏輯。

¹⁶ 國陣以56.5%的得票率取得76.68%的國會席次。

¹⁷ 網路媒體《當今大馬》曾被搜查，並被指為與外國勢力勾結，煽動族群情緒；《哈拉卡》編輯與承印商也在選後被指控出版煽動文章下被捕，同時《哈拉卡》的出版與銷售也受到限制(Zaharom and Wang 2004:262-263)。

三、「撰稿人聯盟」的組成與困境

2000年11月魯乃(Lunas)州議席補選中，相當多的華人選票轉向由安華妻子旺阿茲莎(Wan Azizah)所領導的國民公正黨¹⁸(Parti Keadilan Nasional，簡稱公正黨)，使國陣候選人在這個過去一直是國陣囊中物的選區中落敗，這對國陣是個強烈的警訊，因為前一年因獲得華人支持才穩住政權，如今卻出現選票鬆動的現象，¹⁹對國陣政權形成不可忽視的威脅。國陣政府把矛頭指向中文報紙，認為中文報紙偏袒在野黨，影響了國陣的形象與選情，馬哈迪甚至直接點名批判《南洋商報》與《中國報》反政府(莊迪澎 2004:106)；黃家定也指《南洋商報》與馬華公會過意不去(古玉樑 2006:102)。

國陣政府未立即對這兩家報社採取任何大動作，但事隔半年後，2001年5月間馬華公會透過其掌控的華仁控股，向控制南洋報業的豐隆集團(Hong Leong Group)收購其股權，而在馬來西亞各領域皆有龐大商業利益的豐隆集團，終究抵擋不住威權政府在政治上的強大壓力，拱手讓出南洋報業的經營權。

這項由執政黨收購南洋報業的事件引起華社內部強烈反彈，報社員工、華社團體、非政府組織與學生等都加入抗議行列，成為反對執政黨與媒體集團合謀壟斷媒體的「528黃絲帶運動」(或稱反壟斷運動)。一批自由撰稿人不滿《南洋商報》與《中國報》淪為黨報，也質疑《星洲日報》與《光明日報》在其中的涉入程度，決定不再供稿給這四個報社以示抗議。2001年6月8日，「維護媒體獨立撰稿人聯盟」成立，共有九十名自由撰

¹⁸ 2003年國民公正黨與人民黨(Parti Rakyat Malaysia, PRM)合併，組成人民公正黨(Parti Keadilan Rakyat, PKR，簡稱公正黨)。

¹⁹ 在1999年大選前，兩千多個華團聯署提出《馬來西亞華團大選訴求》(簡稱「訴求」)，要求正視華社的各項要求，馬哈迪在事後承認為了獲取華人選票，原則上接受了華團所提出的十七點要求。到了2000年8月，由巫統控制的《馬來西亞前鋒報》開始撰文指責「訴求」是反馬來人的種族性要求，巫統青年團領袖恫言火燒主導「訴求」行動的雪蘭莪中華大會堂，馬哈迪更指責推動「訴求」者是共產黨與宗教極端分子，引起華人的不滿。

稿人加入，成為「528 黃絲帶運動」中的一支力量。

「528 黃絲帶運動」在短時間內獲得華社各種力量的支持響應，很可能是執政黨的動作觸動了華社敏感的神經線，認為又是政府意圖削弱華族力量的動作，激起華社長期存在的強烈危機感，²⁰必須採取行動加以回應。

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發展過程中，華人社團、中文學校與中文報紙被認為是社會的「三大支柱」(或稱三寶)，是華人建立族群認同與動員捍衛自身權益的重要組織。在國家獨立後，政府透過各種手段，希望能將少數族群使用母語教學的學校逐漸轉型，使全國的學校能以馬來語(國語)進行教學。華人社會普遍認為政府此舉是試圖以蠶食鯨吞的方式消滅中文教育，拔除華人社會的根基和欲將華人予以同化，這樣的例子已在鄰近的泰國與印尼發生，讓許多馬來西亞華人引以為戒，絕不讓這有損中華民族尊嚴的「悲劇」在馬來西亞發生。因此華人社會對政府的「陰謀」高度警覺，進而在族群內部進行頻密動員以抵抗政府的政策，而中文教育成為華社最關注與資源投入最多的領域，甚至把捍衛中文教育上昇至極高的道德層次，不支持「華教」即數典忘祖者，甚至會感受到一定的社會壓力。

在族群政治的氛圍中，馬來西亞社會一直瀰漫著強烈的族群情緒，再加上政客不斷的煽動與挑撥，許多問題很容易被轉化成為族群問題，難以建立理性討論的空間。中文報紙是動員華社力量與建立共識的重要場域，當執政黨介入中文報紙的經營時，極易引起其餘「兩大支柱」的反彈，尤其在華人社團與中文學校甫面對政府不友善的對待後，如今竟輪到中文報紙面臨執政黨直接介入的危機。

在這次收購事件中，被收購的南洋報業旗艦報紙《南洋商報》，歷史悠久，且由頗具聲譽的慈善家陳嘉庚創辦，對馬來西亞華社來說具相當特殊的意義與情感，再加上馬華公會的威信長期備受質疑²¹和曾造成中文報

²⁰ 除「訴求」事件外，政府在 2000 年宣布推行「宏願學校計劃」，準備將以不同語言為教學媒介的小學集中在一起，這計劃被認為最終目的是要消滅中文小學。

²¹ 馬華公會長期被認為「當家不當權」，在國陣政府內部無法展現力量，協助華人保有應有的權利。

停刊的不良紀錄，讓許多華人質疑其政治動機，認為此舉是要威脅華人社會的完整性。由(隆)雪華堂、董總、教總與校友聯總等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華人團體組成「全國華團反對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工委會」(COAT)，號召華人反對執政黨介入媒體，且很快地獲得熱烈支持與回響。

因此，這場反媒體壟斷的運動，是在強烈的族群意識下快速成形，再加上當時馬華公會出現內部的權力爭鬥，兩大陣營在這事件中相互較勁動員，力圖爭取更多華人的支持，讓這場運動迅速加溫。但是華社對「528報變」的反應與行動，基本上僅是要求維護現狀，並非藉機對長期壓制言論和資訊流通的政府體制進行抗爭，對於收購事件中所牽涉的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等概念，其內涵對許多人來說都相當陌生，也並非他們關心的重點(莊迪澎 2003)，更無法以這些抽象理念激起他們參與的熱情。

這可以說是華社特殊歷史發展的結果，在面對龐大國家機關的威脅下，華社多處於被動與消極的防守態勢，救亡始終壓倒啟蒙，所以總是倉促吸收西方的理論與概念後就加以運用，無法靜下心來在知識上進行累積與沉澱，也難以拓寬視野。在過度實用導向下，甚至出現反智的現象，長期深陷在族群政治的框框裡，無力提出更具可能性與想像力的改革方案。

其實在馬來西亞大多數大專院校的傳播學相關課程，深受功能主義學派影響，也過度強調培訓「實用」的傳播生產技能，即以實務訓練為主，其中私立學院傳播學相關課程的這類傾向最為明顯，而以中文做為教學語言的傳播學院也不例外(莊迪澎 2002:147)。大專院校在新聞實務的訓練過程中，經常簡單移植西方客觀式報導的操作模式，未深入理解西方國家所發展的新聞與傳播學觀念，使許多新聞工作者把焦點擺在「表象形式」的訊息告知，簡化與誤認了新聞專業的內涵，也無力進行自省與批判。²²在

²² 歐洲大部分國家的大學未設新聞系，新聞工作者來自不同的教育背景，而新聞工作者來源多元化，是新聞傳播業界保持思想觀念開放、行動具有活力的傳統，他們進入業界後由媒體與同業公會提供在職教育和繼續教育來養成工作技能；日本與澳洲的情況也是如此(陳世敏 2005)。馬來西亞媒體把新聞工作者的訓練責任主要交給大專院校，很少投入資源進行實務人才培訓與提昇專業素質，至於同業公會則較屬於福利與聯誼組織，這種狀況和台灣相當類似。

自我準備不足下，還要面對威權政體和市場壓力，²³讓新聞工作者更難施展自身的能動性。同時，華社始終無法建立傳播學的學術社群，²⁴缺乏對本土相關問題的研究與分析，因此，難以對媒體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與批判，也不易提出具體的改革方案和願景。

在濃濃的族群政治氛圍中，「撰稿人聯盟」成員們的思考未完全陷入族群政治的思考邏輯中，因此在「528 黃絲帶運動」中的角色顯得較為特殊。對「撰稿人聯盟」來說，其成立宗旨是反對政黨控制媒體與反對商業集團壟斷報章，維護中文報業脆弱的相對自主性。因為不少成員曾是新聞工作者或因長期投稿，相當熟悉媒體的事務與操作，也較瞭解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基本內涵，所以使其成為替「528 黃絲帶運動」開闢公共論述的主要團體，成員們撰寫大量相關文章，批判政媒權力的合謀對社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再透過地方性報紙《光華日報》、雜誌《小辣椒》、網路媒體《時代報》、《天網》與《自由媒體》等媒體發表，部分文章也收集在《報殤》等評論集裡。「撰稿人聯盟」的成員也到各地演講，宣揚「528 黃絲帶運動」的理念與號召民眾參與運動。遭到強烈批評的《星洲日報》則刊出讀者來函，指其被迫加入罷寫行列(陳漱石 2001b:32-33)；馬華公會也指責由在野黨組成的寫手，以各種施壓的方式，逼迫自由撰稿人加入罷寫行列(陳漱石 2001b:36)。

2001年6月24日，馬華公會召開特別代表大會，通過收購南洋報業的提案。當收購案已成定局，這場理念與價值不夠普及、深入的運動迅速降溫，在團結族群內部與避免分化的傳統思維下，許多團體與個人放棄原先立場，消極接受了無法改變的「事實」，甚至努力修補與政黨和主流媒

²³ 曾任《南洋商報》總編輯的張木欽認為，編輯權對中文報紙來說，似乎從未確立過，由於業務壓倒編務，使得業務部門經常對編務進行干涉。經過長期形成一種內部文化，即新聞工作者成為習慣服從的一群人，也沒有抗拒的本錢(陳漱石編 2001a:99)。

²⁴ 馬來西亞極少華裔傳播學者，據莊迪澎(2003:25)觀察，理科大學(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USM)傳播學院只有兩名華裔學術人員，但她們都不諳中文，至於馬來亞大學(University of Malaya, UM)、馬來西亞國民大學(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UKM)與瑪拉工藝大學(Mar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UiTM)的傳播系所，都沒有華裔學術人員。至於華社民辦的學院尚處草創階段，累積有限。

體的關係。

這樣的情勢發展並不讓人意外，因為主客觀的弱勢，使華社過去的社會運動/思潮本來都是防守多於進取，旨在維護現狀多於挑戰現狀(曾維龍編 2007:258)。而馬華公會敢於碰觸華社的敏感地帶，且堅持執行收購行動，似乎已相當了解華社的習性與文化，認為只要堅持和撐過去就會讓風波平息，因為原來的反對者多不會堅定反對下去。

在這個缺乏民主自由理念和以族群角度出發的反媒體壟斷運動中，曾出現相當突兀且錯亂的場景，原本反對執政黨介入媒體的華人社團，要求會見國陣主席馬哈迪，向他表達華社的心聲(陳漱石 2001b:26)，希望這個「大家長」能夠介入調解，透過其權威解決「華社內部」的爭議，讓華社能維持現狀。其實，類似這樣的動作屢見不鮮，尤其是出現各種紛爭時，華社都會自然的以訴諸權威方式進行裁決。在這種思維下，「528 報變」後不久發生的英文報《太陽報》(The Sun)易主事件中，雖也可見政治干預的身影，但華社內部卻沒有什麼反應，彷彿與己無關(曾維龍編 2007:259)。

面對客觀情勢的變化，除讓「528 黃絲帶運動」迅速退燒，也對「撰稿人聯盟」內部運作有一定影響，一些成員加入時也是基於族群情感、義憤或其他因素，而非從公民的抗爭思維出發，所以當運動逐漸降溫後，他們陸續選擇離開，停止罷寫的行動，也有一些成員礙於各種原因，在組織中沉寂下來。²⁵

四、「撰稿人聯盟」面對的質疑與轉型

進入這段盤整期後，迫使「撰稿人聯盟」必須釐清自身的定位與目標，但因為媒體與傳播問題相當複雜，多數成員知識背景並非來自傳播領域，對這些問題並沒有較完整的素養與知識，不易提出深刻的分析與清楚的未來願景，以做為行動的理論基礎，再加上組織原本就相當鬆散，成員散居

²⁵ 與黃進發訪談。

各地，使得「撰稿人聯盟」的運作陷入低潮，只能緊抓住成立時的宗旨，繼續對政府與星洲媒體進行批判，尤其是對後者更是不遺餘力的監督。

因此，在外界看來，「撰稿人聯盟」似乎已成爲專門批判星洲媒體的團體，進而限制了其實踐的可能性，不容易把觸角伸展出去，與其他組織進行對話與連結，尤其在華社內部。因爲一般組織要傳遞各種訊息，都相當倚賴主流報紙的宣傳，所以根本不敢得罪發行量最大的星洲媒體。

（一）星洲媒體經營的文化想像

星洲媒體掌握華族強調的「捍衛民族權益」思維，長期經營有關「中華文化」或「中華性」的想像，²⁶所以當張曉卿在「528 報變」後被譴責壟斷中文報業會傷害華人社會時，他在同屬星洲媒體的《亞洲週刊》上做出回應，「如果說我要壟斷華文報業，我最希望由優秀的中華文化來『壟斷』報業，全力維護華人應有的權益，喚醒東南亞的中華之魂」（丘啓楓 2001:53）。這樣的說法在華社內部頗有說服力和能夠引起共鳴，也讓星洲媒體減緩了不少壓力，而這樣的論述方式成爲接下來該集團擴大版圖的論述主軸，譬如 2007 年底星洲集團、南洋報業與香港明報集團合併時，張曉卿(2007:10)提出基調一致的論述，「我全力推動新的媒體集團，不僅是爲了商業的理由，也是爲了文化的理由，只有在一個新的平台上，全球中文讀者才可以享受一個更全面、更優質的文化空間。」同時張曉卿也強調，「《星洲日報》一路走來，始終不敢違背華社與讀者的意願，始終堅定不移的為華社說應說的話，做該做的事，並決心情義辦報，決心回饋社會，決心與華社風雨同舟，榮辱與共。」(星洲日報 2008a)

但是誠如 Leo Bogart 所言，「即便有世界上最好的初衷，也很難使一

²⁶ 針對「中華文化」在「大中華」地區的想像，羅永生對香港的剖析，相當程度上也符應馬來西亞的情況。羅永生認爲，海外華人的這種文化想像與西方殖民統治曾有長久的糾纏經驗，1920 年代香港的英國殖民政權，曾在香港利用「中華文化」的保守性，制衡本地社會的反對力量，制止五四啓蒙運動在香港的展開。這種內含強烈殖民性與封建性的「中華性」，如今透過譬如「新儒家」學說的重返中國大陸，這在海外發展、凝結的「中華性」想像，也愈來愈具體的模塑著包含海內、海外中華世界(即中文、華人世界)的現實(羅永生 2005:79-89)。

家壟斷報紙避免自我陶醉和安於現狀。」(Bagdikian 2004:154)世華媒體強調保存與發揚文化的用心，當然不能抹煞，但是當中也出現一些問題，譬如長期邀請中、港、台文學與文化明星來台，從他們口中不斷讚揚馬來西亞華人對中華文化的堅持，讓很多長期在國內受忽略的許多華人很受用，甚至出現自我陶醉的情形，更加強調從文化面向取得自我肯定，但這也凸顯甚至強化華人對於政治與社會結構問題的無力感，影響了對公共事務的關心。除此之外，世華媒體也積極參與慈善事業，發揮人溺己溺的精神，展現近世中國社會觀中慈善救濟的價值，強調幫助貧困有急難的人與生靈一體的連帶感，但是這裡也有個問題，即慈善觀念所投注的對象，其實是具體的人之災禍痛苦，而不是公共事務本身(陳弱水 2004:108)。

李金銓(2004:146)認為，「報界的財政愈富，言論的膽子愈小」。張曉卿在馬來西亞所掌控的中文媒體規模不斷擴大，在言論上愈趨謹慎保守，經常是隔靴搔癢，且有去政治化的傾向，²⁷這些表現除離「看門犬」的角色甚遠外，其對民主、自由等價值的內涵，並未長期的推廣與深化，多少影響了讀者對民主與自由的理解，也阻礙社會邁向民主化的進程。以台灣的經驗來看，1970年代在國民黨政府嚴厲的監控下，《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相繼成立專欄組，長期向國內外學者邀稿，以拐彎抹角的方式傳遞民主自由等抽象的理念，讓許多讀者從中學習與成長，成為日後台灣民主開放的重要基礎。雖然兩大報被批評為侍從報業，但在促進社會的民主改革，還是有一定的貢獻(李金銓 2004:160-161)。

在華社保守的文化民族主義氛圍下，讓陷入低潮與找不到著力點的「撰稿人聯盟」難以施展力量。在相當一段時間裡，「撰稿人聯盟」並沒有太實質的行動，僅是偶而發布新聞稿和少數成員在一些媒體上撰寫文章，主要還是批判政府與星洲媒體，其中部分言論淪為道德式的批評。部分成員察覺這些問題與侷限，努力做出調整，也嘗試打破僅是針對星洲媒體的刻板印象，但是成效有限。「撰稿人聯盟」現任主席黃進發指出，他

²⁷ 其實馬來西亞各種語文的報紙自1990年代以降，已出現去政治化的情形，減少爭議性議題的報導與討論，提供更多軟性與消費資訊(Mustafa 2002)。

們希望對所有媒體一視同仁，但因為星洲媒體是造成媒體環境惡化的重要因素，被批判的頻率較高，因此「撰稿人聯盟」也難以擺脫「反星洲」的印象，這讓內部成員相當無奈，但也不刻意要去除這樣的標籤和印象。²⁸

（二）《東方日報》創刊後引起的問題

2003年1月1日《東方日報》創刊，這對「撰稿人聯盟」來說又是一項考驗。²⁹《東方日報》一出刊即面臨星洲媒體集團與南洋報業在市場通路上的夾擊，兩大集團透過旗下代理要求報販禁售和派送《東方日報》，讓這新生媒體難以流通和推廣，面臨生存上的極大壓力。《星洲日報》也刊登文章以台灣《蘋果日報》自行建立發行網絡為例，指這是市場競爭的常態(星洲日報 2004)。

《東方日報》的編採高層多來自南洋報業，他們是在「528 報變」中被新經營者所逼退，所以他們獲得另一華裔支持開創新媒體後，也試圖運用被迫受害者的形象，爭取華社的同情與認同，以突破中文報紙被壟斷的局面。³⁰「撰稿人聯盟」部分成員也加入《東方日報》的陣容，其他人則多抱著樂觀其成的態度，希望呵護這份新興的平面媒體，讓它快速壯大。「撰稿人聯盟」中知名度頗高與具號召力的成員都拔刀相助，成為《東方日報》的專欄作者，頻密的發表文章，期盼能提高報紙的可讀性。這些成員也成為《東方日報》向外宣傳的重點，以建立較具深度與言論較開放的形象，和其他報紙做區隔。

在創報初期《東方日報》不時刊登文章、新聞與專題報導，討論媒體壟斷與其被圍堵的問題，甚至直接攻擊《星洲日報》，也引起《星洲日報》的反擊，兩報陸續用了不少版位進行相互攻擊。剛開始「撰稿人聯盟」對

²⁸ 與黃進發訪談。

²⁹ 與傅向紅訪談。

³⁰ 《東方日報》的行銷策略似乎是複製《星洲日報》過去迅速成長的模式，因為1987年《星洲日報》在「華小高職事件」中被政府下令停刊，因此其處境深獲華人同情。《星洲日報》在隔年復刊後，也善用這形象進行促銷，不久就擊敗過去在市場上穩坐龍頭的《南洋商報》，成為發行量最大的中文報紙。

《東方日報》的作風與策略多能諒解，認為這是爲了讓報社站穩腳步所運用的手段，但是經過一段時間後，《東方日報》的內容並沒有太多改善。「撰稿人聯盟」部分成員認為《東方日報》把過多力氣放在攻擊《星洲日報》上，雖然《東方日報》有了反壟斷的光環，卻未著力在新聞專業的面向上，內容依舊乏善可陳，對政府的態度也相當軟弱，多名自由撰稿人的文章在政府壓力下也遭封殺。³¹

《東方日報》的作風與辦報方針讓「撰稿人聯盟」內部有所反省，因此在成立五周年紀念綱領中，不點名指出要避免「528 報變」記憶被取巧消費，讓其坐享道義權威，在面對政治壓制時未展現擔當也多被諒解(曾維龍編 2007:264)。「撰稿人聯盟」部分成員開始與《東方日報》保持距離，並以對其他媒體同樣的標準加以檢驗與要求；但也有部分成員仍同情《東方日報》的處境，³²雖然這些爭議未檯面化和積極加以處理，但一直存在於組織內部。

雖然陸續有一些成員離開或疏遠組織，但也有一些新血認同「撰稿人聯盟」的理念，獲邀加入成爲成員。這批年輕成員並非在「528 報變」氛圍下倉促加入「撰稿人聯盟」，所以族群情感的部分較爲淡薄，思考問題時較能跳脫華人過去慣有的族群本位思維。這批新血的加入，對「撰稿人聯盟」注入了相當的活力，也對內部產生頗多撞擊，讓陷入困境的「撰稿人聯盟」，開始積極思考更明確的定位和進行轉型。

(三)「撰稿人聯盟」定位爲「論述型組織」

「撰稿人聯盟」的核心成員在 2005 年開始調整方向，不再把關懷僅放在媒體機構部分，而是認清所有問題的根源其實是威權國家的制度壓制力量。因此，「撰稿人聯盟」要打擊國家機關惡意限制新聞自由與推動修改鉗制言論自由的法規，爭取整體社會的自由民主，也就是更清楚的從公

³¹ 2007 年 7 月 5 日與傅向紅訪談。

³² 2007 年 7 月 5 日與傅向紅訪談。

民角度對抗不公不義的政權，不再侷限於華社內部的反媒體壟斷議題，甚至是嘗試解除知識分子對中文報紙普遍性的民族主義想像(曾維龍編 2007:9)。

除了內部的自我反省與批判，其他自由撰稿人也對「撰稿人聯盟」提出質疑，譬如在 2005 年 5 月的「528 黃絲帶運動四週年」討論會上，潘永強就質疑「撰稿人聯盟」的定位，到底是知識分子團體或社會運動團體(鄧曉璇 2005)。這樣的質疑過去在內部有一些討論，也有成員撰文回應(吳振南 2005；蘇銘強 2006)，傾向把「撰稿人聯盟」定位為以知識分子為主的「論述型組織」，以深化言論自由與媒體改革的公共論述為主要目標。

在馬來西亞的社會脈絡下，「撰稿人聯盟」選擇的定位主要考量了本身限制與外在需要，因為馬來西亞的華人團體極多，但多屬聯誼性質的組織，很少壓力團體，論述能力較為薄弱。尤其在 1980 年代華社「突圍」高峰期屢遭國家壓制後，社會氛圍愈趨犬儒，要改變這種現象與困境，確實需要在公共論述上下功夫，釐清與分析社會的各種問題，進而才可能有更具體而有效的集體行動，這一點確是「撰稿人聯盟」可以著力的地方。而且「撰稿人聯盟」的成員人數不多，積極者更少，且來自四面八方，不容易聚集參與行動；在經費來源上，主要來自成員的樂捐，要維持平時運作已感困難，實無資源從事各種活動，所以社會運動型的組織方式顯然不太適合「撰稿人聯盟」。

其實，知識分子主導或參與媒體改革不僅在英美出現，亞洲的泰國、南韓與台灣都可看見他們的身影(馮建三 2006:53)。然而有一點較不同的是，這些國家的媒體改革有許多傳播學院知識分子參與，但「撰稿人聯盟」成員中的學院知識分子並不多。學者張茂桂(1990:190)認為，在威權政治體制下，「知識分子」對於社會運動的萌發，最可能扮演開闢新公共論述的角色，但是這些公共論述僅是言論與行動的合理化層次，但還不足以形成社會運動的集體行動。因此，「撰稿人聯盟」的實踐，較接近所謂的「社會遊說」方式，即知識分子透過在媒體上撰述文章或發言，向社會大眾傳

達其看法與主張，同時也透過親身往來，對外演講、座談、示威或向政府人物/單位，傳達其看法與主張(馮建三 2006:49)。

在確定方向後，「撰稿人聯盟」修訂宗旨，決定未來的行動將從兩大面向出發：一是維護和拓展國內的言論與資訊自由、媒體獨立；二是增進我國中文撰稿人與國內外志同道合的團體與個人的聯繫與合作。為了深化和擴大媒體獨立運動的理念與實踐，「撰稿人聯盟」在 2005 年 8 月設立網站《黃絲帶》，其內容主要針對三個面向：一、政治制度批判；二、自由公平競爭；三、媒體專業進步。希望《黃絲帶》能成為公共討論的溝通平台和為文化界注入理論反思與批判的新視野(曾維龍編 2007:249-256)。

在同一個月裡，兩個中文新聞網站《當今大馬》³³(中文版)與《獨立新聞在線》成立，而兩個網站的主編楊凱斌與總編輯莊迪澎皆為「撰稿人聯盟」的成員，長期關注媒體問題，相當積極參與「撰稿人聯盟」的實踐。因此對有關媒體的議題特別重視，也讓許多無法出現在主流媒體的訊息能夠曝光，試圖開拓更大的言論空間，對政府與傳統媒體產生一定的壓力。網際網路的影響力逐漸擴大，尤其是在年輕世代裡，這也讓傳統媒體危機感日益強烈，甚至前國安部副部長胡亞橋透露，一些主流媒體業者要求政府加強管制網路媒體(陳慧思 2006b)；《星洲日報》(2008b)也承認網路媒體的影響力，且以較為負面的描述方式，指網路媒體因為不受出版法的限制，可以更自由的以挑釁和聳動的報導方式取悅讀者，輕易獲得年輕人的喜愛與信任，並指平面媒體更具專業精神，可以更負責任的處理新聞報導與評論，因此委婉地呼籲政府應開放新聞自由。

(四) 集結力量改革媒體環境

2005 年 9 月間，開播近四年的華語電台「嘩!FM」宣布停播，引起不少聽眾的關注，「撰稿人聯盟」首次針對廣電媒體政策部分，提出檢視與建議，引起一些討論。但是「撰稿人聯盟」的這項新嘗試和提出的看法，

³³ 《當今大馬》原為英文版，後來陸續推出馬來文版、中文版與淡米爾文版。

在內部也未達成共識，成員們對不同性質媒體的認知不同，出現了不同的看法，結果在對外言論上出現交鋒的情形。不過，「撰稿人聯盟」基本上放任成員自由發表意見，彼此多能以平常心面對，且認為這些不同聲音都能出現是「撰稿人聯盟」的優點，這也算是實踐理性溝通的理念。³⁴

雖然內部歧異不少，較積極的成員還是持續把矛頭對準國家制度的壓制，尤其在「撰稿人聯盟」現任主席黃進發自英國回國任教後，加速與其他跨族群公民團體的合作與串連，壯大力量以抗衡黨國機構與媒體所形成的結構。所以「撰稿人聯盟」開始與跨族群的「獨立新聞中心」(The Centre for Independent Journalism, 簡稱 CIJ)、「國民醒覺運動-2000 憲章」(Charter 2000-Aliran)等團體展開合作。

誠如 Ben H. Bagdikian(2004:241)所言，基於私利對訊息進行控制，才是人們最大的敵人。因此，這「敵人」不是管理媒體的邪惡個人，而是貪婪與無知結合起來的產物，是對不受監督控制所帶來巨大而隱密的權力。因此，可以這麼說，跨越族群、宗教與文化的政治、商業與媒體所形構之龐大利益集團，是打壓自由與民主的黑手，它們才是大家共同的敵人，必須集中力量加以擊垮。

在 2006 年 5 月 3 日「撰稿人聯盟」推動與 36 個公民團體的聯署，提出「還我新聞自由！廢除出版准證！」的世界新聞自由日備忘錄，指出「部長在《印刷與出版法令》下獨攬發放出版准證的大權是最根本的弊端」。所以要求國會設立「特選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或由個別議員成立跨黨派議員連線(parliamentary caucus)，同時廣泛徵詢民意，建立朝野共識，推動媒體法律的改革(黃進發 2007:11)。但政府對這些要求多不加理會，譬如國安部副部長胡亞橋就認為上述要求僅是少數人意見(陳慧思 2006a)，而民間的回應也相當冷淡。

2006 年 10 月，馬華公會決議將南洋報業控股部分股權轉賣給星洲媒體的老闆張曉卿，使張曉卿成為南洋報業控股的最大股東，也印證了「撰

³⁴ 與傅向紅訪談。

稿人聯盟」成立時的判斷。「撰稿人聯盟」和 47 個跨族群公民團體及政黨聯署反對這項交易，並通過舉辦座談會討論媒體被壟斷的問題；「撰稿人聯盟」更號召評論人撰寫一系列反壟斷評論文章，共有 30 位評論人響應，在一些媒體上連續刊登一個月。一批青年與大專生也到《星洲日報》總社與多個分社展開反對媒體壟斷的請願活動，但仍無法扭轉股權轉移的事實。華社各階層似乎多接受平面媒體被壟斷，不像「528 報變」時出現激烈反應。而張曉卿也啟動旗下媒體為購併事件辯護，星洲媒體集團董事經理兼集團編務總監劉鑑銓認為，外界指責是因為對壟斷出現錯誤認知³⁵(曾維龍編 2007:279-281)。

2007 年 1 月，星洲媒體集團宣布將與南洋報業控股、香港明報集團合併，打造全球性的中文媒體集團，更積極的進軍中國市場。「撰稿人聯盟」對於星洲媒體集團的文化論述策略提出批判，認為張曉卿旗下媒體企圖透過「面向全球」與「發揚中華文化」等口號，逃避在國內應扮演制衡的角色，也凸顯了張曉卿和威權政府的共謀關係(曾維龍編 2007:270-273)。

在 2007 年「528 黃絲帶運動」六週年時，「撰稿人聯盟」推出《黃絲帶飄揚—2006 馬來西亞反對媒體壟斷運動實錄》，為過去一年的工作留下記錄。在民主意識相對低落的社會中，「撰稿人聯盟」從公民角度所提出的批判，試圖戳破操弄族群情緒的論述，顯得曲高和寡，但也慢慢爭取到部分嚮往民主自由的年輕人之認同。

除了持續監督媒體與向政府施壓要求去除惡法，「撰稿人聯盟」也認為媒體環境的惡化，與媒體工作者輕忽專業倫理有關。因此試圖建立管道，讓媒體工作者強化個人的能力與倫理，透過武裝自己後，能與公民團體合作對抗政媒合謀的媒體體制。「撰稿人聯盟」成員嘗試和新聞工作者進行初步接觸，但在中文平面媒體部分遇上極大挫折。因為反媒體壟斷的關係，讓張曉卿所掌控的媒體集團旗下之新聞工作者相當排斥與「撰稿人

³⁵ 根據韓國的《報紙法》，一家報社在市場的佔有率超過 30%，將被視為壟斷市場的寡頭企業(即勁松 2006:43)；法國則規定任何報系集團業者不得擁有超過全國同類報紙發行量的 30%(羅世宏 2003:27)。

聯盟」連繫，廣電媒體部分則有較多的互動。但這些新聞工作者也要小心翼翼，避免被貼上過於激進的標籤，在保守的職場環境中為自身工作增添麻煩。其實在媒體日趨集中化後，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選擇縮減，使其在經濟上的不安全感加深，參與媒體改革的意願也受到影響。

有關媒體改革的想像部分，「撰稿人聯盟」目前階段主要依據的是傳統自由理論，當中「看門狗」角色的重要性壓倒了媒體的其他功能。按照這個在英美流行的觀點，只有把媒體固定在自由市場的體制下，才能確保媒體完全獨立於國家與政府之外(Curran 2006:278-279)。因此，「撰稿人聯盟」關注的議題主要是政治制度批判、自由公平競爭與媒體專業進步，以促進國家邁向民主化。

Curran(2006)指出，「媒體是公眾看門狗」觀點產生於十八世紀初，當時報紙內容主要是公共事務，惟如今媒體主要內容已讓位給娛樂資訊，這也使「看門狗」的主張顯得有些陳腐。然而，李金銓(2004:30)認為，從台灣、南韓、墨西哥、南非與南美洲的例子來看，市場競爭確實有助於擴大自由表達的空間。當這些國家透過市場競爭提升自由民主後，也帶來一些社會問題，這是日後必須要注意的問題。

馬來西亞的媒體並未努力積極地宣揚與深化民主、自由等理念，民眾對這些理念的認知與理解仍明顯不足，因此媒改行動不易吸引民眾的參與。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媒體組織必須思考其他的策略，以突破目前困境。「撰稿人聯盟」認為，讓一個跨語言、族群、宗教的「資訊與言論自由社群」(an information and expression freedom community)成形，是目前迫切需要努力的方向。然而，目前更大的挑戰其實在於跨越各語言社群內部的自由與保守的對立(曾維龍編 2007:260)。跨越這些障礙後，才可能打破族群本位的思維，連結更多的力量挑戰威權政體，改善整體的媒體環境，擴大與完善公民的傳播權。

五、小結

馬來西亞威權政府延續英國殖民政府的統治方式，透過族群政治的運作，將國內主要的三個主要族群分而治之，刻意凸顯彼此的差異，讓各族群一直圍困在族群分歧的情緒中，難以理性合作對抗長期壓制民間社會的政府。雖然有愈來愈多的民間團體進行跨族群、語言與宗教的合作與連結，但其力量還不足以撼動整個威權體制，自由民主的理念不易生根。

馬來西亞有太多問題要處理，但這社會並沒有足夠多的人在不同領域長期耕耘，使得相關問題不斷延伸與惡化。成立七年的「撰稿人聯盟」，成員來自各領域，僅能在巨大的生活壓力下緩步推動改革。在這過程中不易持續保有實踐的熱情，尤其社會長期瀰漫犬儒的氛圍，讓媒改行動的開展更顯困難。

「撰稿人聯盟」是在南洋報業控股被執政黨收購後出現的團體，在短時間內決定以罷寫的方式表達對政媒集團的不滿。經過多年後，其成員們多仍堅持不在四家中文報紙發表文章，以具體行動抗拒被收編。雖然罷寫的行動與效果引起一些質疑，但是在馬來西亞的社會環境中，這樣的堅持仍值得肯定。但是從整體的媒改行動來看，罷寫也讓「撰稿人聯盟」難以擺脫「反張曉卿」的標籤，對媒改行動的開展增添不少障礙，尤其在爭取新聞工作者的合作部分。

經過不斷的反省、摸索與實踐後，「撰稿人聯盟」慢慢開展出一條媒體改革的道路。不過「撰稿人聯盟」自詡為精英的論述型組織，外界對它往往賦予過高的期待，讓其成員頗感壓力。³⁶當然，我們可以理解「撰稿人聯盟」成員目前在知識力上可能不足，要耕耘媒體改造論述這領域確實不易，但既然定位為論述型組織，如何繼續深化與拓寬相關論述，「撰稿人聯盟」似乎難以迴避。

³⁶ 與傅向紅訪談。

「撰稿人聯盟」主席黃進發坦承目前做的不夠多，³⁷這需要有多人加入，尤其是對相關領域有專長的人，一起發展論述與社會行動。但這部分又不能和社會脫節，必須可以和民眾溝通，讓他們能夠瞭解改造傳播環境與個人生活切身相關，進而願意付諸行動，將媒體改革發展成一個全體公民參與的運動。但是「撰稿人聯盟」還必須面對一個在許多國家的媒改運動中，基本上都會遇到的問題，即閱聽人視自身為消費者，因此，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對媒體的不滿，不易和公民權利意識連繫在一起。因為行動主體的缺乏或尚未成形，使得媒體改革運動難以動員，無法展現力量，突破長期的困境。因此，如何透過培力的方式，讓公眾能意識到媒體與傳播對自身的重要性，不再被消費者身份與族群政治的思維所框限，是「撰稿人聯盟」可以著力的地方。而媒體素養應是一個可行的方向，也能為媒改行動蓄積更多的能量。

誠如馮建三(2006:63)在回顧台灣公共電視建構過程時指出，知識分子的重要工作在於提出、說明、分析與倡導價值，使其普遍且深入，讓社會的進步志業得到較大的共鳴與實踐機會。對「撰稿人聯盟」來說，除了要達到橫向面的連結，也要能夠深耕民主自由的理念，才可能對整體媒體環境形成更有力的衝擊，進而改善馬來西亞的媒體生態，協助社會邁向民主的道路。

這個努力的方向，在最近社會整體氛圍出現變化後，有了較有利的發展趨勢。2008年3月8日馬來西亞舉行第十二屆全國大選，國陣威權體制遭受重創，失去三分之二的國會絕大多數席次，在野黨更取得五個州的執政權。原有的族群分歧在這次選舉中也有所淡化，讓馬來西亞社會呈現相當不同的景象。對媒體改革運動來說，也出現了更多的空間與可能，譬如在野黨取得執政的雪蘭莪州州務大臣承諾制訂資訊自由法(陳慧思2008a)、國會在野黨領袖也把媒體改革視為任內五大議題之一(陳慧思2008b)。面對這新的政治情勢，「撰稿人聯盟」必須有所調整與因應，但是

³⁷ 與黃進發訪談。

要改善媒體環境，還是需要公眾對相關議題有更多認識與理解，而這是一條漫長而必須走的路。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星洲日報》(2004)〈台灣報紙不污蔑對手〉。2月24日，第3版。

Bagdikian, Ben H. (2004)《媒體壟斷》(The Media Monopoly)(吳靖譯)。石家莊：河北教育。

Curran, James (2006)《媒體與權力》(Media and Power)(史安斌、董關鵬譯)。北京：清華大學。

王國璋 (1997)《馬來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台北：唐山。

丘啓楓 (2001)〈報人雄心烈，不懼流言急〉。《亞洲週刊》，15(24): 52-54。

古玉樑 (2006)《528 南洋報變大揭密》。吉隆坡：大眾科技。

李金銓 (2004)《超越西方霸權》。香港：牛津。

祝家華 (1994)《解構政治神話》。吉隆坡：華社資料研究中心。

郎勁松 (2006)《韓國傳媒體制創新》。廣州：南方日報。

馮建三 (2006)〈台灣公共電視的建構與擴大，1990-2006〉。《傳播與社會學刊》。1:47-67。

莊迪澎 (2002)《看破媒體》。吉隆坡：破媒體。

_____ (2003)〈華人社會、中文報業與新聞自由運動〉。《人文雜誌》。19:14-25。

_____ (2004)《強勢首相 VS 弱勢媒體》。吉隆坡：破媒體。

陳世敏 (2005)〈建構以記協為中心的專業文化〉。《目擊者》。45:12-17。

陳弱水 (2004)〈傳統心靈中的社會觀：以童蒙書、家訓、善書為觀察對象〉。見李丁讚編：《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台北：桂冠。頁 63-109。

- 陳漱石編 (2001a) 《華文報變天全記錄》。吉隆坡：泊世工作室。
- _____ (2001b) 《華文報天變再記錄》。吉隆坡：泊世工作室。
- 張茂桂 (1990) 〈知識分子與社會運動〉。見蕭新煌編：《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台北：巨流。頁 189-209。
- 張曉卿 (2007) 〈人間五月天的激情與願景〉。《亞洲週刊》，21(20):10。
- 黃招勤 (2004) 〈西馬來西亞華文報之發展與困境〉。台北：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進發 (2007) 〈528 黃絲帶之歌—馬來西亞中文社群之獨立精神〉。曾維龍編：《黃絲帶飄揚》，頁 3-18。吉隆坡：維護媒體獨立撰稿人聯盟。
- 曾維龍編 (2007) 《黃絲帶飄揚》。吉隆坡：維護媒體獨立撰稿人聯盟。
- 楊建成 (1982) 《馬來西亞華人的困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潘永強、魏月萍編 (2002) 《解構媒體權力》。吉隆坡：大將。
- 潘永強 (2004) 〈馬來西亞的政黨體系〉。見潘永強編：《舊政權新政府》。吉隆坡：大將。頁 159-175。
- _____ (2007) 〈族群政治的宏觀調控〉。見孫和聲、唐南發編：《風雲五十年：馬來西亞政黨政治》。吉隆坡：燧人氏。頁 86-89。
- 羅永生(2005) 〈談「中華性」當中的「殖民性」〉。見陳光興編：《批判連帶》。台北：台社。頁 79-89。
- 羅世宏 (2003) 〈廣電媒體產權再管制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0:1-48。

西文部分：

- Curran, J. and Park , Myung-Jin (2000) "Beyond Globalization," in James Curran and Myung-Jin Park (eds.) *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pp.3-18.
- Gomez, E.T. (1999) *Chinese Business In Malaysia*. Richmond: Curzon.
- Khoo, Boo Teik (2003) *Beyond Mahathir: Malaysian Politics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Zed Book.
- Mustafa K. Anuar (2000) "Country Report: Malaysia." An AMIC Compilation. *Media & Democracy in Asia*. Singapore: 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re. pp.97-114.
- _____ (2002) "Defining Democratic Discourse," in Kok Wah Francis Loh and Boo Teik Khoo (eds) . *Democracy in Malaysia*. Surrey: Curzon Press.

pp.138-164.

Nain, Zaharom (2000) "Globalized Theories and National Controls: The State, The Market and The Malaysian Media," in James Curran and Myung-Jin Park(eds.) *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pp.139-153.

_____ (2002) "The Structure of the Media Industry: Implications for Democracy," in Kok Wah Francis Loh and Boo Teik Khoo (eds.) *Democracy in Malaysia*. Surrey: Curzon Press. pp.111-137.

Nain, Zaharom and Mustafa K. Anuar (2000) "Marketing to the masses in Malaysia: Commercial Television, Religion and Nation-building," in French D. and Richards M.(eds.) *Television in Contemporary Asia*. London: Sage. pp.151-178.

Nain, Zaharom and Wang, Lay Kim (2004) "Ownership, control and the Malaysian media," in Pradip Thomas and Zaharom Nain (eds.) *Who owns the Media*.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pp.249-267.

網路資料：

《中國報》(2008) 〈《富士比》大馬富豪榜 身家 42 億 陳志遠進十大〉。5 月 22 日。網址: http://www.chinapress.com.my/content_new.asp?dt=2008-05-23&sec=business&art=0523bs15.txt(2008/9/3)

《星洲日報》(2008a) 〈能接受時代考驗 《星洲日報》獲華社愛戴〉。1 月 2 日。網址: <http://www.sinchew.com.my/content.phtml?sec=1&artid=200801020970>(2007/1/2)

《星洲日報》(2008b) 〈新聞自由，離春天還很遙遠?〉(社論)(年 5 月 2 日)。網址: <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5491>(2008/5/3)

李萬千(2006) 〈開場白〉。《獨立新聞在線》。5 月 31 日。網址: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php?n=1453> (2008/3/15)

吳振南(2005) 〈從追求新聞自由到爭取言論自由〉。網址: http://www.wami528.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57&Itemid=15(2008/3/1)

陳慧思(2006a) 〈新聞自由備忘錄僅少數人看法 胡亞橋:李萬千指責毫無根據〉。《獨立新聞在線》。5 月 4 日。網址: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php?n=1646> (2008/3/22)

陳慧思(2006b) 〈反對管制網絡媒體 主流媒體人籲政府為媒體鬆綁〉。《獨立媒體在線》。8 月 1 日。網址: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php?>

n=2237%E2%80%9C%20%20target=(2008/9/5)

陳慧思(2008a) 〈明天覲見雪州蘇丹組新政府 卡立承諾立法保障透明度〉。《獨立新聞在線》。3月9日。網址:<http://www.merdeka.com/news.php?n=6185>(2008/3/20)

陳慧思(2008b) 〈首位女性國會在野黨領袖 旺阿茲莎任內專注五議題〉。《獨立新聞在線》。3月25日。網址:<http://www.merdeka.com/news.php?n=6348>(2008/3/25)

鄧曉璇(2005) 〈潘永強:民間社會力孤單薄弱,難以抗衡媒體壟斷〉。網址:http://www.wami528.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73&Itemid=16 (2008/3/1)

蘇銘強(2006) 〈我的 526 講稿〉。網址:<http://thefreedia.com/index.php/columns/13304> (2008/3/1)

受訪者：

黃進發,「撰稿人聯盟」現任主席;訪問日期與時間:2007年7月6日,1915-2100pm。

傅向紅,「撰稿人聯盟」現任委員;訪問日期與時間:2007年7月5日,1500-1600pm。

